

两个“L”型轨迹

——中国经济增长中期和长期展望

□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一、“V”型复苏已成历史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每逢经济下滑之后,总是能够见到随后的增长复苏,呈现一轮又一轮的“V”型增长格局。事实上,当阻碍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方面时,采用刺激总需求的方式,往往能够较快奏效,使实际增速回归潜在增长率,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能够呈现“V”型复苏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供给侧,过去长期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助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并且不可逆转。在这种环境下,难以依靠以往的方式让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原来的速度。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在劳动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当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成为历史,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势必会发生作用,资本回报率也会相应地下降,而这正好是中国当前的状况。相关研究表明,2004—2013年,资本回报率从24.3%下降到14.7%,以年均5.7%的速度下降(白重恩、张琼,2014)。

在通常情况下,当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部门,由于资源配置的优化,便可以获得资源重配效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贡献。目前,中国通过劳动力重新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也在变得更加缓慢。由于16~19岁农村人口(外出劳动力的主体)规模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峰值,导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增速大大放缓,例如2015年其增速仅为0.4%。也就是说,在现行体制下,目前可以用于重新配置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配置完毕,由此再难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观改善。除此之外,如果户籍制度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体制性制约不消除,由于不能获得均等的城镇社会保障,农民

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陆续返乡,则可能出现新增农民工少于返乡人口的情形,从而形成城乡劳动力的逆向流动。

以上这些都是从供给侧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根据这些变化因素,预测中国经济在不同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总体的画面是:“十二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为7.6%,如果不发生重要的改革和经济刺激政策,“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平均6.2%(Cai and Lu,2013)。

二、近中期的“L”型增长轨迹

虽然不再期冀产生一个“V”型的速度反弹,但是,从供给侧施力的结构性改革,则可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的体制性因素,取得潜在增长率下行曲线更加平缓的效果,分别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事实上,2016年每个季度都保持在预期的增长速度区间内,并将实现全年6.7%的增长率。相对于此前的持续减速趋势,这个部分由于改革红利的释放、部分由于总需求的扩大而实现的增长率,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短期的“L”型企稳变化。

受此启发和鼓舞,完全可以进一步预期,在依靠改革释放红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在中期实现另一个更加明显的“L”型增长轨迹。根据不同假定前提下的预测,在“十三五”这个近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区间,平均应该在6.2%~6.7%之间。但是,无论是下限还是上限,均会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确保“L”型轨迹运行于下限和上限之间,实际上就是确保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总体平稳和稳中有进。简单地说,确保经济增长没有下降到下限以下,就是保证不出现周期性失业,是保民生的基本前提。尽管中国当前尚未发生明显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但当实际经济运行指向这个底线时,应当高度警惕。确保经济增长没有上升到上限以上,就是保证不出现经济泡沫,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风险。

由于当前已经不存在增长缺口,因此超越上限的增长背后,可能是过度的刺激,可能是大量的流动性进入非实体经济。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保民生”还是“防风险”,设置增长的下限和上限都是必要的;而在二者之间的改革行动,有望中近期“L”型轨迹的实现。

如果预期从2017年开始,改革红利适度地逐渐释放,经济增长速度呈现这样的趋势,即按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规律,低于以往的增长速度,然而下行的速度比2012年以来的情况更加平缓,同时在“十三五”时期的后四年保持大体上6.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那么,这个速度会使得今后的实际增长显示向增长区间上限靠拢的趋势。这样一来,在增长速度下限和上限之间,实际增长曲线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L”型的中期增长轨迹。这个速度既可以保证GDP总量在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也是比较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

三、更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

只要各项供给侧改革得以积极推进,改革红利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释放,中国经济也有望在较长时期内实现“L”型增长轨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多,这些领域的改革不仅可能收获本领域的改革红利,而且各领域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促进的效果,形成“综合改革红利”。

以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供给侧效应:一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劳动参与,从而显著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例如,目前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中,20~39岁年龄段的人口大约超过8000万人,7000万人左右介于40~59岁之间。由于没有获得城市的户籍身份,农民工年龄过了40岁就开始陆续返乡。也就是说,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因此不能均等享受城镇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服务、子女教育、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他们仍然具有很高就业能力的时候就退出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实现了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镇劳动力供给则可以显著增加。二是清除了制度性障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我把这个提高生产率的结构调整过程称为“库兹涅茨过程”,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可以改进生产率。反之,新成长的进城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少,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龄返回农村的人口会多于进城的人口。虽然农民工返回农村并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转移到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就业,因此这种过程就变成了“逆库兹涅茨过程”,从

而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还有明显的需求侧效应,主要表现为增加的新市民扩大了消费者群体。

此外,“三去一降一补”改革,分别具有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的效果;通过教育与培训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可增强当前和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而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配套政策的完善,有利于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格局,等等。与最直接、最主要的供给侧效应相伴随,这些领域的改革还能够带来一系列需求侧的利好效果。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根据户籍制度、教育和培训、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可能产生的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的效果做出假定后,再结合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可能对未来劳动力供给产生的改善效果,模拟了不同的潜在增长率情景,或称改革红利情景(Cai and Lu, 2016)。在不同情景中,改革越是深入,越能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越是接近于“L”型。

按照中国经济在不同改革情景下的潜在增长表现,可以回答中国在什么时候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阶段,从而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依据以上改革情景,给出了一个较为可能的预测:中国2014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7400美元左右,属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按照改革深入的情景预测,2022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12600美元左右,即基本叩开高收入阶段的大门。需要说明的是,跨进高收入阶段的门槛之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成了发达国家。例如,历史上有的拉美国家曾经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后来又倒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迄今尚未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大门,即受困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争取到长期“L”型增长的情况下,发展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19000美元左右,就更加稳定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2040年左右达到32000美元左右,进一步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到了2050年,中国的高收入水平得到巩固,人均GDP可达到52000美元左右,跻身较高水平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预测所呈现的美好前景,是以得到深化改革红利为基础的,而改革所需要的力度最大,难度也最大。现实的改革力度和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总之,在人口红利释放殆尽之后,未来的“L”型增长需要仰仗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各领域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套和同步,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改革红利持续最大化,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财经智库》第2卷第2期,约10000字